

日本企业版“故乡税”在地方振兴中的促进作用

杨 扬 胡 澎

内容提要：企业版“故乡税”是日本自2016年起实施的一项服务于地方振兴^①战略的具体制度。该制度通过企业向注册地以外的地方自治体捐献资金，缓解区域间税收分配不均问题，成为联通日本企业和地方自治体的桥梁，并为二者在地方振兴上深度合作创造契机，推动区域发展中的官民协同。企业版“故乡税”研究可为深入理解日本地方振兴战略提供重要分析视角，同时，在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也可为我国创新区域协同治理路径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企业版“故乡税” 地方振兴 区域差距 财政转移支付

作者简介：杨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2488）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7）

中图分类号：F73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498/j.cnki.dbyxk.2025.04.007

文章编号：2095-3453（2025）04-0113-14

日本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面临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人口和产业逐步向首都都市圈集聚，加剧了“东京一极集中”的趋势。占国土面积六成的自治体面临过疏化现象，^②导致地方经济活力衰退，农村和偏远

① 日语称“地方创生”，是指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一系列综合性举措，其内涵不仅限于经济振兴，还涵盖文化保护、社会福祉、教育提升及环境保护等多领域的协调发展。“地方创生”强调充分利用地区独特的文化、历史及自然资源，通过创新性解决方案来应对人口减少、经济停滞等挑战，同时通过产业振兴与新型资源开发重新发现区域价值。

② 「令和4年度版 過疎対策の現況」、総務省、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44362.pdf [2024-12-03]。

地区产业空洞化，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加重，难以维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时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中加剧了地方社会的凋零和老龄化，进一步削弱了区域间的均衡发展与社会稳定性。面对这一系列挑战，日本政府迫切需要重新审视地区间生产要素的配置，探索有效对策以激发社会活力。2014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地方振兴战略。作为该战略的补充机制，2016年，日本在原有“故乡税”（个人版“故乡税”政策）的基础上，制定了仅面向企业的“地方创生应援税制”（企业版“故乡税”）。

个人版“故乡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强制性纳税，而是一种捐赠形式的税收优惠制度，鼓励居民自主选择认定的“故乡”进行捐赠，以通过年度汇算清缴减免个人税款。作为回报，捐赠者可获得地方特产，还能助力地方发展。相比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日本创新之处在于将捐赠与税务优惠明确结合，同时赋予捐赠者选择“精神故乡”的自由权利，所谓展现了精神归属感与财政激励的独特融合。而自2016年起推出的企业版“故乡税”进一步利用减税政策激励企业向地方自治体捐赠，助力地方振兴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部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①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同样面临城乡融合发展的问題。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来消除城乡间资源和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双向流动与发展。这不仅是高质量发展所需，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日本企业版“故乡税”创新性地调动社会资本为地方发展赋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这一探索或可为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制度创新提供一些新思路。

一、企业版“故乡税”制度的前身——个人版“故乡税”

企业版“故乡税”的前身是2008年实施的个人版“故乡税”制度。2007年，日本福井县知事西川一诚首次提出“故乡税”的设想。他认为，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2024-11-22]。

大量地方出生、成长的人才因学业、工作等原因向外迁出，这部分人群的税收惠及了大城市，却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人才外流的损失。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制度，使他们自愿向家乡缴纳部分税款。^①基于此，2007年6月，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牵头成立了“故乡税研究会”；经历了五个月的反复讨论后，10月由日本总务省发布《故乡税研究会报告书》。^②2008年4月30日，包含“故乡税”相关规划的《部分修订地方税法等的法律案》在众议院正式通过^③，确定了“故乡税”的法律依据。5月，个人版“故乡税”制度正式确立并开始实施。

个人版“故乡税”制度的核心机制是，鼓励个人根据自身喜好向都道府县或市町村捐款并获得税额抵扣和返礼品。该制度通过所得税和居民税的综合扣除机制，让捐赠者的实际负担仅限于2000日元，从而激励捐赠行为。实施之初，“故乡税”的抵扣申请程序复杂，给制度推进造成不小阻碍。但2015年引入的“一站式特例制度”降低了进行“故乡税”操作的难度。该制度实施后，个人在进行“故乡税”捐赠后即使不进行年度税务申报也可以申请捐款税收抵扣，使得制度的推行更加顺畅。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数据，2015—2023年，“故乡税”制度的使用人数和捐赠金额呈现显著增长趋势。捐赠金额从2015年度的1652.9亿日元增长至2023年度的11175亿日元，增长了约6.8倍；捐赠件数从726万件增长至5894.6万件，增长了约8.1倍。^④但制度的实施也遇到波折，2019年包括静冈县小山町、大阪府泉佐野市等在内的一市三町因提供超过捐赠金额30%的高额返礼品，被排除在制度的参与名单之外。^⑤这些地方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

① 「ふるさと納税制度について“故郷寄付金控除”の提案」、総務省、https://www.soumu.go.jp/main_sosiki/kenkyu/furusato_tax/pdf/070718_1_si6.pdf [2024-04-15]。

② 「第9回ふるさと納税研究会報告書」、総務省、https://www.soumu.go.jp/main_sosiki/kenkyu/furusato_tax/pdf/houkokusyo.pdf [2024-04-25]。

③ 「地方税法等の一部を改正する法律 法律第二十一号」、衆議院、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housei.nsf/html/housei/16920080430021.htm [2024-04-25]。

④ 「ふるさと納税に関する現況調査結果（令和6年度実施）」、総務省、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960670.pdf [2024-12-03]。

⑤ 「ふるさと納税、泉佐野市など4市町除外を正式発表」、日本経済新聞、<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044766350U9A510C1EA2000/?msocid=2459de8865526aee1fd3cbcd64116bb8> [2024-12-03]。

违背了制度公平原则，也对其他自治体形成了不平等的竞争压力。这一事件反映了制度在规范地方自治体行为和防止过度竞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总体而言，个人版“故乡税”制度的成效超出预期。

二、企业版“故乡税”制度的产生与实施

2014年地方振兴被提升为日本国家战略，成为应对人口减少、超老龄化和地方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的核心措施，“故乡税”制度也随之作出改变，延伸至企业层面。

2016年，日本内阁府推出“地方创生应援税制”制度，为地方提供资金支持。因该制度在模式上与2008年的个人版“故乡税”制度相似，实施主体是日本企业，通常被称为企业版“故乡税”，是指企业向地方自治体实施地方振兴计划捐赠时，可享受法人税额抵扣的制度。^①可见，该制度是个人版“故乡税”制度的一种变体，也是一种类似于慈善捐款的非强制性捐赠税制。企业可选择向其注册地之外的其他地方自治体捐款，并在企业注册地获得税收抵扣优惠。企业版“故乡税”的捐款用途主要集中于国家认定的地方振兴相关项目，如地方交通、医疗、福利、教育和文化环境的改善等项目。企业根据实际需求，选定注册地以外的地方自治体作为捐赠对象，并依据地方振兴计划确定捐赠金额及其用途。地方自治体向企业颁发捐赠证书，并将资金用于企业指定的项目。在企业的年度汇算清缴中，捐赠金额可计入慈善捐赠支出，从而享受较高比例的法人税减免。

2016年企业版“故乡税”制度实施初期，企业的税收减免额度约占捐赠金额的60%，这一限制导致制度的实际利用率不高，企业参与积极性受到影响。2020年税制改革对该制度适用范围、减税额度以及认定手续等方面进行了大幅调整和优化，尤其将减税额度从捐赠金额的60%提高至90%。^②2020年税制改革激发了政策活力，大幅提高了企业的捐赠热情和地方自治体筹措资金的效率，对企业版“故乡税”的发展具有突破性

① 「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について」、内閣官房創生本部事務局、<https://lfb.mof.go.jp/hokuriku/content/003/2021100403.pdf> [2024-04-30]。

② 「令和2年度税制改正 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の拡充・延長」、内閣府、<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R2kakuzyuu-encyou.pdf> [2024-06-11]。

意义。

企业版“故乡税”诞生于日本地方振兴战略广泛推进的大背景下。由于地方振兴在日本是需要国家和地方自治体通力配合推进的国家级课题，所以该税制的运用主要是通过企业捐赠来为地方财政带来积极影响。为探究该制度对地方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实际效果，需进一步明确其实施过程及具体运用情况。

（一）围绕企业减税额度的改革

在企业版“故乡税”推出之前，日本企业向地方自治体的捐赠被全额计入成本，享受约30%的法人税减免。为提高“故乡税”对企业的吸引力，在制度制定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提高税收减免比例成为的核心议题。围绕减税额度达到捐赠总金额的90%这一关键目标，制度的制定经历了三个阶段。

制度确立初期，根据日本内阁府颁布的《2016年度税制改革纲要》，在30%法人税减免额度的基础上，对缴纳“故乡税”的企业予以法人税、法人事业税及法人住民税的税额扣除，这一新增减免比例约占总金额的30%。使企业税收减免金额约占捐赠金额的60%。^①其中具体规定为法人事业税扣除10%、法人住民税扣除20%，不足部分从法人税中扣除。为避免税收流失过多，《2016年度税制改革纲要》中还引入了区域间税收平衡政策，对因执行企业版“故乡税”导致税收流失的自治体进行补助，“故乡税”的减收部分将被纳入地方交付税的基准财政收入基数，确保税额流出的地方自治体能够获得国库补贴。减免上限分别为法人住民税和法人事业税的20%、法人税的5%。^②

2020年税制改革大幅提高了企业版“故乡税”的利用率，企业的减税比例提升至90%，延长了制度期限，使得该制度与地方振兴战略的融合更加紧密。具体而言，改革前企业捐赠的税前扣除比例为30%，法人住民税和法人税的合计扣除比例为20%，法人事业税为10%，最大可减免60%；

^① 「平成28年度税制改正大綱」、自民党、https://storage2.jimin.jp/pdf/news/policy/131061_1.pdf [2024-06-18]。

^② 「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について」、内閣官房創生本部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dai8/seidosetsumei.pdf> [2025-04-30]。

而改革后，法人住民税和法人税的扣除比例提高至40%，法人事业税提高至20%，最终实现90%的税额扣除。^①此次改革将减税额度提高至前所未有的九成，优化了制度的制定，简化了地方自治体编制地方振兴计划的程序。改革前，地方自治体需为每个项目单独编制计划并逐项进行认证；改革后，自治体可将多个项目整合为综合性地方振兴计划，由内阁府对整体计划进行统一认证，从而简化了编制要求。此外，改革还允许地方自治体在项目费用尚未完全确定前，根据估算金额提前募集企业捐赠资金，使得企业捐赠的时间限制也得以放宽。改革前，企业须在地方自治体获得项目认证后方可提出捐赠意向，且捐赠仅在项目完成后才能支出；改革后，企业在项目认证通过但尚未启动时即可提前进行捐赠，大幅提高了地方振兴项目实施的资金筹集效率。

2020年10月13日，日本总务省向全国地方自治体发布通知，宣布设立“人材派遣型企业版故乡税”制度。^②该制度鼓励企业将员工派遣至地方自治体或直接在当地设立办公室，可在税收方面享有人力成本等费用的优惠。时任总务大臣武田良太在记者会上表示：“通过利用企业版‘故乡税’机制，企业可将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派遣至地方自治体，以进一步充实和强化地方振兴。借助这一机制，地方自治体可接收从事捐赠项目的专业人才，而无需承担实际人力成本”。^③该制度允许企业将人力成本等支出作为对地方自治体的捐赠。通过引入人才派遣机制，企业版“故乡税”与各自治体的地方振兴战略进一步结合，以员工流动为地方自治体的振兴计划补充人才。

（二）企业版“故乡税”制度的实施情况

自2016年企业版“故乡税”制度设立至今已满九年。单从数据看，该制度达到了预期效果。根据日本内阁府地方创生推进事务局公开数据，

① 「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について」、内閣官房創生本部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dai8/seidosetsumei.pdf> [2025-06-30]。

② 人材派遣多指将具备特定技能或专业知识的员工或人才从一家企业或机构临时派遣到另一家企业或机构工作。

③ 「武田総務大臣閣議後記者会見の概要」、総務省、https://www.soumu.go.jp/menu_news/kaiken/01koho01_02000956.html [2024-06-18]。

2016—2023年，企业捐赠件数从最初的517件增至14022件，增长了约27倍；捐赠总金额从7.47亿日元攀升至470亿日元，增长了约63倍；参与捐赠的企业数量也从459家增加至7680家，增长了约16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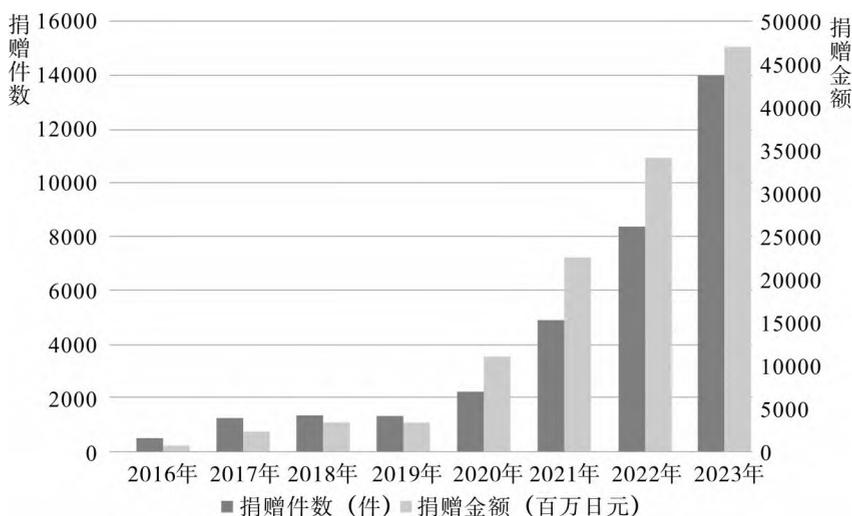


图1 日本企业版“故乡税”实施效果

资料来源：「.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の令和5年度寄附実績について（概要）」、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5_keinen_zisseki.pdf [2024-10-10]。笔者根据资料制作。

2020年税制改革后，吸引了更多地方自治体尝试接受企业版“故乡税”的捐赠。根据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数据，2023年接受捐赠件数最多的自治体为石川县和北海道，接受捐赠金额最多的为宫城县、北海道和群馬县。^②这些地区大多为偏远地区或当年受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区域。

企业版“故乡税”制度允许企业向各自治体制定的“地域再生计

① 「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の令和5年度寄附実績について（概要）」、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5_keinen_zisseki.pdf [2024-10-10]。

② 「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の令和5年度寄附実績について（概要）」、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5_keinen_zisseki.pdf [2024-10-10]。

划”^①所规定的四类目标进行捐赠，分别为促进就业、人口回流、工作方式改革、社区营造。2023年企业版“故乡税”捐赠资金在各项目的使用金额相比前一年有显著增长，总金额从2022年的341亿日元增加至2023年的470亿日元，增长了约38%。^②该制度为推动地方经济活力和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提供了一定资金支持，缓解了自治体申请和使用地方振兴交付金的困难。

此外，日本政府在2019年12月20日发布的第二期《城市·人口·就业振兴综合战略》中，设定了企业版“故乡税”的第一版关键绩效指标，即在2024财政年度前，至少1000个地方自治体参与利用该制度的捐赠金额。^③2022年12月23日发布的“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综合战略”进一步设立了新的关键绩效指标，计划到2027年前，参与企业版“故乡税”制度的地方自治体增加至1500个。^④

（三）企业版“故乡税”的限制因素

日本内阁府在制定政策之初便对企业版“故乡税”的实际使用作出了以下一些限制，^⑤其核心目的是防止企业通过捐赠获取经济利益或向其总部所在地进行税收返还，同时引导资金向财政资源不足的地区流动。

一是企业单次捐赠金额需达到10万日元以上，只有达到此金额才被纳入政策适用范围。此规定意在减少零散捐赠带来的管理成本，同时提升政策的实施效率。二是禁止企业通过捐赠获取直接经济利益，例如以捐赠为条件获取补助金或招投标便利，旨在防止企业利用政策进行商业利益交

① “地域再生计划”指根据日本《地域再生法》及《地域再生基本方针》等制定的，由地方自治体自主编制并经内阁总理大臣认定的地方事业计划。通过该计划，日本地方可以享受多项财政支持措施。

② 「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の令和5年度寄附実績について（概要）」、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5_keinen_zisseki.pdf [2024-10-10]。

③ 「第2期 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内閣府、<https://www.chisou.go.jp/sousei/info/pdf/r1-12-20-senryaku.pdf> [2024-10-12]。

④ 「デジタル田园都市国家構想総合戦略（2023改訂版）」、内閣官房、https://www.cas.go.jp/jp/seisaku/digital_denen/pdf/20231226honbun.pdf [2024-10-15]。

⑤ 「地域再生制度」、内閣府、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6_chiiki_panf.pdf [2024-10-12]。

换或操控，但允许地方自治体宣介捐赠企业名称。三是企业不得向其总部或主要营业地点所在的地方自治体进行捐赠，旨在防止企业通过向公共团体捐赠将税款以补助等形式返还至自身所在地区。四是部分财政状况良好，能够通过地方税独立运作、无需从国家获得地方交付税的“不交付团体”^①不适用于此项制度。这些地区通常财政资源较为充裕，不需要额外财政支持，所以不在制度推行的范围内。

企业版“故乡税”的四项使用限制旨在防止企业通过捐赠换取直接经济利益或作出其他违反制度核心意图的行为。然而，在实际实施中，部分企业和自治体仍存在私下协商的违规行为，尤其是在资金使用和项目选择上的透明度不足可能引发权力寻租风险。因此，保障该制度的实施效果尚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管和问责机制。

三、企业版“故乡税”在地方振兴中的作用

在地方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尽管地方自治体可通过提交地方版综合战略向日本内阁府申请财政支持，但由于申请流程复杂、资金使用限制较多以及分配额度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导致许多自治体实际项目资金远低于预算，难以满足施策需求。在此背景下，企业版“故乡税”政策以其捐赠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成为各自治体地方振兴的重要财源补充。随着地方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版“故乡税”与地方振兴战略的进一步结合，逐渐成为地方自治体应对实际需求的重要选择之一。

（一）各类地方振兴事业的捐赠支持

2020年修订版《城市·人口·就业振兴综合战略》发布后，日本内阁府进一步引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理念，^②各地方自治体更加注重将企业捐赠直接引导至核心项目，提升项目与当地发展的契合度。各自治体地方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四类。

一是促进就业，包括中小企业扶植、生产力提升与系统化扶植项目

① 根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数据，2023年无需从国家获得地方交付税的自治体已达83个。

② 「第2期『まち・ひと・しごと創生総合戦略』（2020改訂版）」、内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https://www.chisou.go.jp/sousei/info/pdf/r02-12-21-senryaku2020.pdf> [2024-12-03]。

等。二是推动人口回流，包括移居咨询与区域推广、移居者生活保障等。三是改革工作方式，包括工作与生活平衡项目、女性与儿童项目。四是助力社区营造，包括小型社区与生活环境营造、社区再生项目等。

2016—2023年，企业版“故乡税”对四类地方振兴事业的捐赠金额呈现持续大幅增长的趋势，捐赠总额由2016年的7.47亿日元增长至2023年的469.99亿日元。其中，促进就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捐赠金额七年间由5.36亿日元增至214.09亿日元，为捐赠金额增长最高的领域。社区营造领域捐赠金额由2016年的1.11亿日元增至2023年的181.59亿日元，占比由14.9%上升至38.6%，成为占比提升最快的领域。相比之下，人口回流和工作方式改革两项捐赠金额相对较低，合计金额由2016年的1亿日元增至2023年的74.31亿日元，占比由13.4%微幅上升至15.8%，但总额仍保持了显著增长趋势。^①

从数据看，促进就业方面的捐款比例接近总金额的一半，主要由于其涵盖地区产业振兴、旅游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等诸多内容。而人口回流方面包括促进外来人口的移居和定居等项目，其项目规划相对简单，也是近期地方振兴的工作重点，所以捐款增长速度较快。

神奈川县平冢市以推动海浪发电产业与地方振兴为目标，依托产学研协同平台“平冢海洋能源研究会”，利用企业版“故乡税”的捐赠资金支持平冢海浪发电站的相关实验，并同步推进电池驱动船和海浪发电船的研发，降低海浪发电成本。本项目吸引了包括日本雅虎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参与捐赠，共募集资金达5500万日元。^②

三菱UFJ银行利用网络和社交媒体资源，有效吸引公众参与。该公司在北海道公开征集有特色的地方振兴项目课题，并制作相关项目宣介视频，通过社交网络服务面向“Z世代”发布，最终选定六个项目，以三菱

① 「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の令和5年度寄附実績について（概要）」、内閣府、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R05_keinen_zisseki.pdf [2024-12-03]；「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について」、内閣府、<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ortal/pdf/dai8/seidosetsumei.pdf> [2024-12-03]。

② 「令和5年度地方創生応援税制（企業版ふるさと納税）大臣表彰 受賞者 取組概要」、内閣府、https://www.chisou.go.jp/tiiki/tiikisaisei/pdf/dai6kai_hyoushoujirei.pdf [2024-11-10]。

UFJ 银行及其关联企业的名义进行捐赠。此外该公司还利用“故乡税”捐款设立基金支持北海道 2050 年实现零碳目标的“零碳北海道”计划。该公司通过灵活运用网络平台开展“故乡税”捐赠活动，提升了社会关注度，有利于公众形象。

企业版“故乡税”制度意在服务地方振兴综合战略。尽管不同自治体和企业的实践方式各有差异，但该制度有利于地方自治体深入挖掘本地区特色项目，转变地方自治体过于依赖中央《地方振兴综合战略》框架、项目同质化、缺乏地域特色的状况，有助于提升自治体的主动性与创新能力。同时，地方自治体通过竞争企业捐款，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发展质量。

（二）地方自治体与企业的协同框架

企业版“故乡税”政策的运行机制需要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体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地方政府层面，在这一体系运作中，业务部门、地方振兴部门和财务部门通过分工协作，共同对接企业。其中，业务部门负责项目设计和推广，吸引捐赠参与；地方振兴部门统筹区域再生计划，使项目符合本地发展目标，并支持各部门的宣介工作；财务部门负责资金管理，并与税务部门协调，优化非税收入的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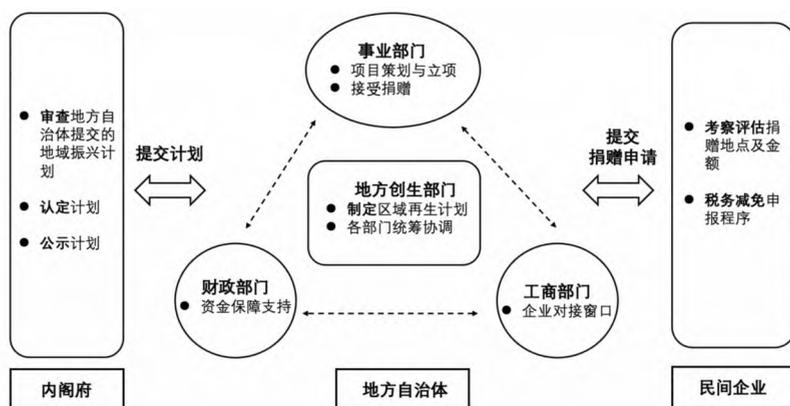


图2 日本地方自治体内部协同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制作。

此外，地方自治体之间的协作至关重要。例如，北海道通过设立“北海道应援团会议”这一跨部门平台，借助门户网站和专题研讨会向企业宣

传可供选择的捐赠项目，优化企业参与的路径并增强了项目吸引力；同时通过定期举办联络会议，促进了北海道各自治体间的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提升区域内企业资源的吸引力和分配效率。自2020年起，日本内阁府地方振兴推进事务局定期举办名为“地方创生SDGs官民合作平台——企业版‘故乡税’分科会”的专题研讨会，邀请不同自治体分享吸引企业版“故乡税”捐赠和实施地方振兴的经验并加以推广。

四、企业版“故乡税”制度评析

企业版“故乡税”制度不仅是个人版“故乡税”政策的简单扩展，而是通过引导企业向特定自治体捐赠的一项创新制度，有利于优化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缓解区域间税源分配不均，推动财政资源合理配置。该政策旨在应对日本“东京一极集中”下首都圈过度城市化及地方衰退问题，体现了综合性社会治理理念。

一是引导企业支持地方发展。企业版“故乡税”政策将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税收调控目标相结合，使企业的捐赠行为成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税收优惠措施激发了企业的参与意愿。

企业在选择捐赠对象时，通常优先考虑能够与其商业利益或企业社会形象相契合的地区。例如，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或地方振兴政策规划完善的地区，往往成为企业捐赠的首选，有利于展示企业形象。此外，部分企业倾向于捐赠与其业务高度关联的项目，如食品加工企业通常向原材料产地的农业项目提供资助，以利供应链稳定与生产可持续。企业的这种选择与中央政府推动地方振兴的政策目标相契合，构建起有利的财政资源流动机制。

二是为地方财政注入可持续动力。在推动地方振兴的过程中，日本各地方自治体的主要财政来源包括中央政府每年发放的“数字田园都市国家构想交付金”，以及本地税收中划拨的专项地方振兴预算。然而，对于财政基础薄弱、税源稀缺的边远地区，仅依靠传统财政转移支付难以满足持续发展的需要。企业版“故乡税”政策为这类地区引入了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财政补充机制，成为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的重要支柱。尤其在企业与地方自治体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后，该政策有利于提供稳定的财政支持，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提升地区经济抗风险能力与发展弹性。

三是构建企业、地方自治体与国家的协同效应。企业通过参与地方捐赠，获得税收优惠，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而地方自治体则借助财政支持，推动区域经济振兴，优化本地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日本政府通过这一政策平台，有利于缓解区域间财政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这一多层次合作模式不仅展现了政策设计的统合性，更体现了企业主动参与、地方有效治理与国家政策引导之间的协调互动，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区域治理提供了经验。

四是政策实施中的问题与改进方向。尽管企业版“故乡税”政策谋求兼顾国家、企业及地方自治体三方利益，力求增强各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和受益程度，并辅以一系列补充措施，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该政策仍暴露出了一些执行上的问题。

首先，尽管企业版“故乡税”在2020年税制改革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截至2023年底，其规模仍不足500亿日元，与每年约2000亿日元的日本地方振兴交付金相比，政策贡献占比仍不足，均摊到每个自治体的捐赠额度较为有限，难以覆盖地方振兴核心项目的资金需求。该制度更多体现为补充性财政手段，而非地方发展的主体资金来源。

其次，不同自治体所获捐赠规模差距显著，进一步加剧了资源倾斜。例如宫城县、北海道等具有较高区域吸引力、宣传覆盖广且地方振兴规划清晰的自治体，每年获得的捐赠金额较高。而有的自治体能力有限，缺乏足够的宣传能力和系统性的地方振兴规划，难以通过该政策有效缓解财政和发展困境。另外，日本77个地方交付税的“不交付团体”被排除在制度参与之外，但这些自治体往往因经济发达成为企业总部所在地。企业版“故乡税”的交付使得自治体税收外流，尤其东京都是税收外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围绕“东京的钱包”展开的攻防使得东京与地方的矛盾加剧。

最后，实施过程中暴露了监管力度不足。企业版“故乡税”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明确禁止自治体向捐赠企业提供利益回报，包括在招标中给予便利或以优惠利率提供贷款等，然而实际运行中仍会出现违规现象。2024年，日本福岛县国见町因违规行为成为被内阁府首个取消企业版“故乡税”认定项目的地方自治体。有很多企业在捐赠时选择不公开名称，以避免其他自治体的推销式宣传行为，暴露了该制度透明性和监督力度方面的不足。为确保该政策有力落实，还需要强化中央政府的政策监管职能，引

入独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加强制度性保障与操作性优化。

五、结语

地方振兴战略是日本应对地方经济衰退和人口流失危机采取的重要措施。企业版“故乡税”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一次制度性尝试，通过税收激励调动社会资本，弥补传统财政转移支付模式的不足。

2024年11月，日本首相石破茂将地方振兴定位为“日本经济的引爆剂”，并计划设立“新地方经济与生活环境创生本部”，在此框架内实施新一轮地方振兴战略，企业版“故乡税”作为区域振兴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更具政策职能。后续企业版“故乡税”的改革重点是优化政策激励机制，减少地方自治体间的发展差距，缓解捐赠资源集中于少数优势地区的现象，防止税收套利与利益输送等问题，通过建立更严格的信息公开与监管体系，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我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①为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区域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实现政策工具创新，成为值得思考的课题。日本企业版“故乡税”通过差异化税收激励与地域认同构建，其经验启示在于，可通过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加强企业捐赠行为与区域发展目标的精准对接，同时注重政策协同与制度创新，从而激发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动力。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创新，企业版“故乡税”的实施经验展现出通过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公共事业的政策潜力。这一尝试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也许可以为其他国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方面提供有益参考。

（责任编辑：张倩）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国政府网，2021年4月30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30/content_5604050.htm [2025-02-26]。

The Promoting Role of Japan's Corporate Hometown Tax in Local Revitalisation

YANG Yang, HU Peng

Japan's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Program, implemented since 2016, serves as a concrete mechanism for the country's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rogram incentivizes companies to donate to local governments' designate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s" through substantial tax reductions of up to 90% focusing on initiatives promoting employment, population retention and work-style. By offering tax incentives to encourage corporate donations to local governments, the program has alleviate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ax revenue among regions. It acts as a bridge connecting Japanese enterpris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deeper collaboration on specific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s. This provides an innovative pathway for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the corporate donations have shown significant growth, becoming an important supplementary funding source for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funds and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its implementation, which require funding scale and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requiring future reforms. The research on the Corporate Hometown Tax Donation Program offers a valuabl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Japan's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hina in innovating 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pproaches. The program demonstrates how tax leverage can effectively mobilize private capital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governance. It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hold significance for exploring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designs in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corporate hometown tax; local revitalization; regional disparities; fiscal transfers